



北大教育经济研究 (电子季刊)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search (Beida)
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主办
Institute of Economics of Education, Peking University

第4卷第2期
(总第11期)
2006年6月

主编: 闵维方; 副主编: 丁小浩 闫凤桥;

编辑: 岳昌君 孙毓泽

社会分层对于高等教育分层的影响 ——西安民办高校学生家庭背景的实证分析^①

沈祖超 阎凤桥

(北京大学 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871)

摘要: 本文以社会分层对教育分层影响的理论为基础, 以西安 5 所民办高校 3624 份学生调查问卷数据和其他数据为依据, 分析了学生家庭背景对于他们接受高等教育机会和毕业去向意愿的影响。研究直接或间接地发现, 家庭职业和教育背景对于子女能否接受高等教育具有正向影响; 接受民办高等教育或公立高等教育学生的家长在不同教育程度的分布比例上存在着差别; 家长的受教育水平对于子女进入民办高校中计划内招生项目、学历文凭试点项目或自学考试招生项目具有正向作用, 家长的职业和经济收入水平对之却有负向作用; 家长的受教育水平、职业和经济收入水平对于子女毕业后升学意愿具有正向影响。我国社会分层对于教育分层产生的多方位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结构及影响的不确定性, 也预示着今后社会分层将会对教育分层产生越来越稳定的影响。这种发展趋势具有深刻的政策含义。

关键词: 社会分层; 教育分层; 民办高等教育; 实证分析

Abstract: By employing 3624 questionnaires from five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Xi'an City, Shaanxi Provi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on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Major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ly, parents' vocational prestige and educational level have positive impact on possibility of children's higher education; secondly, parents whose children are in public and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have different educational level and distribution; thirdly, parents' educational level has positive impact on quality of children's programs in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but parents' vocational type and income have negative impact on quality of children's program in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fourthly, parents' educational level, vocational type and income have positive impact on children's willingness for further education after

作者简介: 沈祖超(1980—), 男,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硕士毕业生。

阎凤桥(1963—), 男, 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副教授, 博士。

graduation from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he study has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Key words: Social stratification;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China's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empirical analysis

目前,我国高校在录取学生时有两个基本要求:(1)学业水平要求,入学者需参加(分地区的)选拔性入学考试,成绩须达到一定的水平;(2)经济要求,由于高等教育是义务后教育,所以学生必须交纳一定的学费和其他费用。在双向选择机制作用下,上述两个基本要求交互作用的结果会出现四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的学生可以顺利地被高等学校录取;第二种情形是同时不满足两个条件的学生失去了进入高等学校学习的机会;第三种情形是有些学生虽然学业考试成绩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但是受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无法交纳应交的学费和其他教育费用,国家和高等学校对于这些人正在采取发放助学金、贷款、减免学费等一系列措施,帮助他们解决上学的困难;第四种情形是家庭有足够的经济能力,但是由于学业考试成绩达不到规定的要求,所以不能被正规的高等学校录取,正在兴起的高等教育市场化(包括民办高等教育机构和出国留学)为这部分人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在学业成绩和经济支付能力双重因素的作用下,在高等教育机构内外形成一个家庭背景的差序格局,即在高等教育机构之外既有家庭社会经济背景较好的人员,也有家庭社会经济背景较差的人员;在高等教育机构内部,情况也是一样的,进一步分析,还可以找出接受不同类型和质量高等教育与学生家庭背景之间的关联性。分析高等教育机构内部学生家庭背景成分,对于制定有关的政策有所帮助。公共政策对于教育机构和对于受教育者的关注原则是不同的。对于教育机构来说,公共政策原则是统一的,采取奖勤罚懒、奖优罚劣的原则;对于受教育者来说,公共政策倾向于帮助教育弱势(经济弱势、文化弱势、生理弱势)群体摆脱困境,改善他们的受教育状况。由于学生的学业准备状况往往与其非教育因素有一定的正向关联性,所以公共政策对于教育弱势群体的倾斜,也就是向教育准备不足人群的倾斜。将公共政策的机构资助原则和个人资助原则结合起来考虑,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如果弱势群体主要集中在优秀的高等学校,那么公共政策可以将对机构资助和对个人资助的原则统一起来,兼顾效率和公平。现实的情况往往是弱势人群常常集中在办学条件和办学水平差的学校,制定公共政策就会遇到效率和公平兼顾原则相悖的情况。对于优秀学校的财政倾斜政策,虽然体现了效率原则,但是却意味着更多的公共资源流向强势人群,与公平原则不符;反之,对于办学水平差的学校的财政扶持,虽然体现了公平原则,但是却意味着以牺牲一

定的效率为代价。高等教育所有制多元化格局加重了高等教育公共政策上的这种悖论。如果弱势群体较多地集中在公立高等教育机构,而强势人群较多地集中在民办高等教育机构,那么公共政策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倾斜于公立教育机构;但是,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甚至恰恰相反。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制定公共政策呢?这是过去常常忽略的一个问题,也是本文触及到的一个问题。本文提出的研究问题是:民办高校学生具有怎样的家庭经济和社会背景?学生家庭经济和社会背景对于他们的教育选择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一、社会分层与教育分层

笔者通过对相关研究文献的检索发现,已有的研究主要是探讨社会分层与教育机会差异之间的关系。下面,我们先对相关的研究文献进行一个简要的评述,然后介绍本研究的设计和结果分析。

(一) 社会分层与教育公平

社会分层是根据获得有价值物的方式来决定人们在社会中的群体等级或类属的一种持久模式,一般根据韦伯确定的财富与收入(经济地位)、权力(政治地位)和声望(社会地位)这三个关键维度来划分社会阶层。目前的社会分层研究大都与职业相关,主要因为人们的收入与声望水平在现代社会中都受职业的影响。^[1]陆学艺以职业为分类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提出我国有十大社会阶层。^[2]

在社会分层框架下研究代际和代内关系的时候,人们研究的焦点是上升性社会流动。^[3]1967年,布劳和邓肯开创了地位获得研究,他们把注意力放在影响个人职业的一系列特殊事件上,如父亲是如何影响儿子的。他们的分析显示,在人们的工作声望变异中,大约有1/3是由他们自己的教育总量加以预测和解释的,由于他们获得的教育又与其父亲的职业和教育有很大的相关性,所以模型的最终结果是儿子职业地位17%的变异可以从他们父亲的职业地位得到解释,子女受教育时间长短19%的变异可以由其父亲的地位解释。^[4]

1966年,科尔曼对于美国教育生产函数的研究阐明,公立学校资源对学生学业成绩没有显著影响,学生家庭社会等级却显著地影响着学生的学业成就。^[5]

在上述两个研究之后,对于不同社会阶层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研究迅速增多。这些研究多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个层面是公平视角下的教育获得研究;另

一个层面是在社会分层视角下的教育获得。

(二) 公平视角下的教育获得

哈尔西(Halsey)对英国的实证研究表明,以家庭背景为指标的先赋因素(ascription)和以教育文凭为指标的获致因素(achievement)在代际之间职业地位的传递中都发挥着作用,路径分析结果表明,二战后家庭背景变量(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对于子代教育的直接影响比二战前有所增加。^[6]虽然教育规模的扩展使得西欧劳工阶级的受教育面扩大了,但教育在改变社会结构方面并没有太大的成效。^[7]

自人力资本理论提出以来,许多国家都不断增加教育投入,扩大教育规模,提高教育水平。教育的扩张是否会导致教育的供给朝着公平的方向发展研究表明,发展教育对哪个社会阶层有利,取决于政策的变化、扩张学校的类型以及新增的入学机会在整个教育系统中的分布状况。^[8]

对于我国教育公平的实证研究发现,在实施高校收费政策之后,经济因素成为影响入学机会的直接原因。1999年高校扩招之后,学费水平的提高改变了某些类型高等学校(如师范学校)的学生构成^[9];来自农村和城镇的考生以及父亲身份分别是农民、工人、干部子女,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和专业分布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均等^[10];但尚未发现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比例随着时间的发展有减少的趋势。^[11]从总体上看,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有利于女性接受高等教育,与此同时,女性接受高等教育仍面临着所占比例较低、学科专业选择较窄、就业难、城乡阶层差异大等问题。^[12]

公平视角下中国教育机会均等的研究,对于了解究竟谁在接受什么样的教育有很大的帮助,但这些研究并没有对究竟是什么原因影响教育机会给出明确的回答。

(三) 社会分层视角下的教育机会

现代教育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整个社会的就业与职业体系。^[13]而学校教育作为一种文化生产,其本身就是一个不平等的体系。仅仅消除某些物质障碍以及把学习能力作为接受教育的标准,是不能实现教育机会均等的。^[14]大学既保护了那些出生在上层家庭中人们的特权,同时也为那些来自下层的人跃居高位创造了条件。^[15]

在大众化和普及化高等教育阶段,教育市场化是影响高等教育内部分层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底层高等教育的筛选不再是通过学业成就,而是通过金钱。

[16]

Seeberg 对 1985~1991 年中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系统中的社会分层研究显示,在入学机会上,最上层和最下层的家庭保持了他们所处的地位,而位于中层的家庭不管在农村还是城市,在统招方式中保持着一种流动的形态。他认为这是一个随着经济迅速发展、技术继续进步而呈现的阶层再生产的画面。^[17]logistic 回归模型的 R^2 为 0.08。

1949 年之后,地区差异是影响个人受教育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18]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国家政策不同,教育机会也有很大差异。^[19]父亲的文化程度、家庭出身、性别和居住地对教育提升的影响,随着国家政策的变化而变化。^[20]现代化水平(非农人口比重)对性别不平等和城乡不平等以及教育获得的结果不平等都具有缓解作用,但是随着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却会强化父亲教育、职业地位所带来的教育不平等。^[21]在教育与职业相关性逐步增长的过程中,父亲的教育程度而非职业类型对受访者的教育获得产生了更大的影响。^[22]

总之,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教育不平等状况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学生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是一个重要因素。

二、数据与研究方法

(一) 数据

本研究采用西安民办高校学生的调查数据,调查范围为西安 5 所民办高校。这 5 所民办高校主要招收三类学生,他们分别是:计划内学生、学历文凭生和自考生,本文将后两类学生称为计划外学生。问卷发放主要在 2004 年 5 月到 2005 年 1 月期间,研究者根据分层抽样原理提出各类学生的调查数目,请学校的相关人员发放下去。调查共发放问卷 40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3624 份,有效回收率为 90.6%。在回收得到的有效调查问卷中,男女生比例基本相等,计划内与计划外学生所占的比例也接近,66%的学生家庭年收入低于 15000 元,1/3 以上的学生家庭年收入低于 5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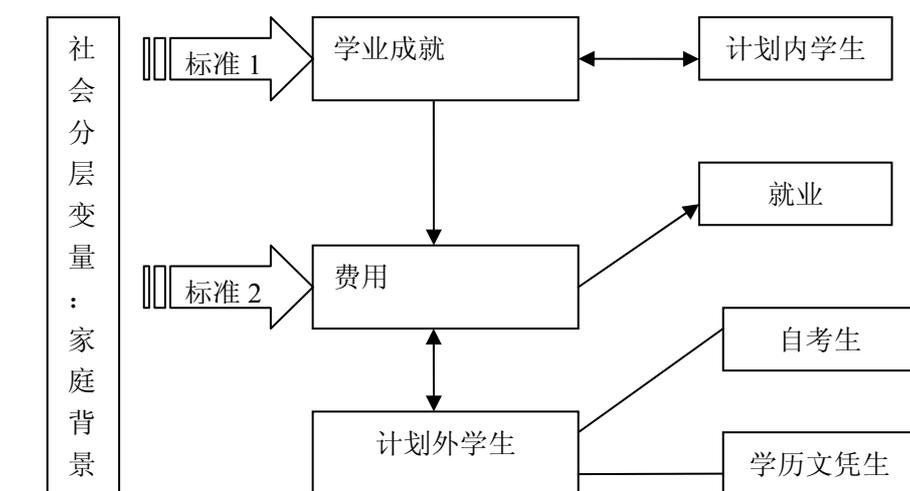
为了解民办高校学生家庭经济状况的相对位置,需要将民办高校调查数据与社会总体情况进行比较,为此,采用了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在民办高校与

公立高校的对比时,采用了北京大学教育学院2003年组织实施的大学毕业生问卷调查数据。

(二) 分析框架

根据社会分层与教育的关系,学生家庭背景变量(父亲受教育程度、职业和经济收入)将会对学生学业成绩有正的影响。如前所述,民办高校有计划内和计划外两种学生,一般来讲,前者的学业成绩要优于后者的学业成绩。因此,民办高校的学生构成为研究社会分层与教育分层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现实场景。我们可以提出如下假设:在民办高校中,家庭背景好的学生更容易进入计划内招生对象,而家庭背景差的学生更容易成为计划外招生对象。同理,当学生计划毕业去向的时候,家庭背景较好的学生有更大的可能选择继续求学,而家庭背景较差的学生有更大的可能会选择立即就业。

本研究的分析框架见图一。具有一定社会经济背景的考生选择报考民办高校时,在满足不同的入学成绩要求和学费要求后,分别进入计划内招生项目或计划外招生项目(文凭试点和自学考试),这是民办高校内部的第一次教育分层;等学生毕业时,他们或者选择就业,或者选择继续升学,这是第二次教育分层。本研究不仅研究学生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在这两次教育分层中的作用,还将对比民办高校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平均状况及公立高校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以期掌握民办高校学生构成和分布特点,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 表示通过或接受某种标准
→ 表示未通过或不接受某种标准
⇒ 表示待验证的影响

图一：社会分层对教育分层(民办高等教育部分)影响分析框架图

(三) 研究假设与方法

根据前人的研究和以上的理论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两个研究假设:

假设一: 父亲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水平对其子女成为计划内学生有正的影响。

假设二: 父亲受教育程度、职业水平和家庭年经济收入对学生具有继续升学的愿望有正的影响。

对上述两个假设的验证, 均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中, 因变量 y 有两个值: 以 $y=1$ 表示事件发生 (进入计划内招生项目和具有继续升学的愿望); 以 $y=0$ 表示事件未发生 (进入计划外招生项目和没有继续升学的愿望)。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的形式如下:

$$\ln[p/(1-p)] = z = a + \sum \beta_k x_{ki}$$

其中, $p = p(y=1|x_{1i}, x_{2i}, x_{3i}, \dots, x_{ki})$ 表示自变量 $x_{1i}, x_{2i}, x_{3i}, \dots, x_{ki}$ 为给定系列值时事件发生的概率。

三、实证研究结果

(一) 不同教育程度和类型家庭背景比较

民办高校学生父母职业划分的比例见表 1。从职业来看, 在民办高校学生中, ①父亲职业为农民 (包括渔民) 的学生所占比例 (22.6%) 大大低于该职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 (42.9%), 而父亲职业为个体户或私营企业经营者的学生所占比例 (23.6%) 大大高于该职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 (7.1%+1.0%=8.1%)。将民办高校学生父亲上述两种职业类型所占比例与全国总体情况比较来看, 民办高校学生家庭社会背景要好于全国平均水平。可以推测, 接受民办高等教育学生的家庭背景要比没有接受任何形式高等教育同龄人的家庭背景好。

表 1: 民办高校学生父母职业及中国十大社会阶层^[23]

职业类型	父 亲		母 亲		中国十大社会阶层	
	人数	比例 (%)	人数	比例 (%)	阶层名称	比例 (%)
失业下岗	208	5.9	350	10.1	城乡无业、(半) 失业阶层	4.8

① [23] 十大社会阶层的划分和比例来自于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同注[2]), 本表按照阶层从低到高顺序排列。学生父母的职业类型和中国的社会阶层并非一一对应。计算取舍, 总比例可能不等于 100.0%。

农民或渔民	793	22.6	1169	33.7	农业劳动者阶层	42.9
工人	531	15.1	467	13.5	产业工人阶层	17.5
专门人员	117	3.3	74	2.1	商业服务人员阶层	11.2
一般职员	316	9.0	393	11.3	个体工商户阶层	7.1
公务员	246	7.0	113	3.3	办事人员阶层	7.2
技术人员	303	8.6	97	2.8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	4.6
高级管理职员	140	4.0	65	1.9	私营企业主阶层	1.0
个体户或私企 经营者	830	23.6	684	19.7	经理人员阶层	1.6
其他	26	0.7	57	1.6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	2.1
合计	3510	99.8	3469	100.0		

民办高校学生父母受教育程度见表2。从受教育程度指标来看,民办高校学生父亲的受教育程度为文盲、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学、大学以上所占比例分别为0.8%、6.7%、27.6%、52.9%、11.2%和0.8%。汇总有关数据后得到民办高校学生父亲的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所占比例为35.1%,高中及以上所占比例为64.9%;母亲受教育程度低于父亲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所占比例为50.3%,而高中及以上所占比例为49.7%。^①

表2: 民办高校学生父母受教育程度

受教育程度	父 亲		母 亲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文盲	29	0.8	144	4.1
小学	240	6.7	551	15.5
初中	983	27.6	1090	30.7
高中(中专)	1886	52.9	1568	44.0
大学	400	11.2	188	5.3
大学以上	26	0.8	14	0.4
合计	3564	100.0	3555	100.0
缺失值的人数	60		69	

^① [25]在《2004中国发展报告》中,教育年限的计算方法为: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按16年计算,而高中(中专)、初中、小学、文盲分别按12、9、6、0年计算,这一计算得出学生父亲年龄组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27年,高出初中0.27年。但是考虑到学生父亲受教育时期大多数小学为5年制,故大专及以上、高中(中专)、初中、小学、文盲分别按15、11、8、5、1年计算,这一计算得出2000年35—44岁男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31年,高出初中0.31年,故二者计算区别不大,但是这一计算更适合我们的研究群体。

民办高校学生家长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与社会平均受教育程度相比如何呢?为此,要估算社会平均受教育水平。1998年,我国6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09年;2003年,这个数字达到7.91年。[23]假设民办高校在校生的年龄在18—22岁之间,学生父亲年龄在39—48岁之间,则他们与2000年人口普查中35—44岁范围相对应。从人口普查的数据来看,35—44岁男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31年[25],35—44岁男性的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的占71.41%,在高中及以上的占28.59%。将这个数据与表2中数据相比,可以看出,民办高校学生父亲受教育程度高于社会中同龄人父亲受教育程度。可以推测,接受民办高等教育学生的家庭教育背景要比没有机会接受任何形式高等教育的同龄人家庭教育背景好。

根据目前的情况,民办高等教育的平均办学条件和质量要低于公立高等教育的平均办学条件和质量。那么公立高校学生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与民办高校学生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相比又如何呢?表3将特定年龄段男性成员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西安民办高校学生父亲的受教育程度、调查得到的公立高校学生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和北京大学学生父亲的受教育程度进行了对比,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上所占的比例分别为:28.59%、64.90%、52.70%和72.00%,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所占的比例分别为:71.41%、35.10%、47.30%和28.00%。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民办高校学生父亲的受教育水平在高中以上所占比例大于公立高校学生父亲的受教育水平在高中以上所占比例,而民办高校学生父亲的受教育水平在初中及以下所占比例小于公立高校学生父亲的受教育水平在初中及以下所占比例。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估计是,公立高校学生父亲小学教育水平的比例较高。但是,如果比较父亲的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者所占比例,则公立高校显著高于民办高校。北京大学学生父亲的受教育程度高于民办高校和其他公立高校学生父亲的受教育程度。

表3: 西安民办与公立高校学生父亲受教育程度比较^[26] (单位: %)

		大专及以上	高中或中专	初中	小学	(半)文盲
2000年35—44岁男性		6.15	22.44	47.61	21.82	1.98
西安民办高校	学生总体(3564)	12.0***	52.9***	27.6***	6.7***	0.8***
	计划内学生(1554)	12.0***	53.9***	27.2***	6.4***	0.5***
	自考生(639)	10.3***	49.9***	32.1***	6.3***	1.4
	学历文凭生(1261)	12.5***	53.2***	25.9***	7.4***	1.0*
公立高校本专科生	学生总体(15367)	23.9***	28.8***	26.6***	17.3***	3.4***
	计划内学生(14837)	24.0***	28.9***	26.6***	17.2***	3.3***
	计划外学生(523)	20.1***	26.0*	27.7***	19.9	6.3***
北京大学本科98—01级		48.2	23.8	18.8	7.8	1.5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接受高等教育人群的家庭职业和教育背景要好于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人群的家庭职业和教育背景。从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来看,他们的家庭背景与其接受高等教育的类型(公立高校或民办高校)没有一致的关联性。具体地讲,与民办高校相比,公立高校学生父亲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和大专及以上者所占比例较高,而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和初中者所占比例较低。

(二) 社会分层对教育筛选的影响

上面比较了年龄组社会平均受教育程度、接受公立高等教育和接受民办高等教育学生家庭背景。下面比较民办高校内计划内学生和计划外学生的家庭背景。考虑到省份间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不同及在录取分数线上的差异,在分析家庭背景对学生成为民办高校计划内或计划外学生的影响方面,仅选择了来自同一个省——陕西省的学生,样本量为885人。

本文采用父亲的受教育程度、职业和家庭年收入作为家庭背景变量,家庭年收入为定序变量,用1—5分别代表家庭年收入在5000元以下、5000-15000元、15000-30000元、30000-50000元、50000元以上。在回归方程中,以 $y=1$ 表示

^① [26] 学生类型后面圆括号里的数字是数据中该类型学生数。表中所做的显著性检验,是与2000年人口普查35—44岁男性受教育程度的比较,显著性水平:*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01$ 。本表中用到的人口普查数据由作者根据人口普查资料计算得到,人口普查资料来源为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年版)2000,公立高校的数据来源为北京大学2003年实施的毕业生调查问卷,经过作者计算得到,北京大学数据来源:哈巍. 高等教育机会均等与学生资助——北京大学个案研究[D]. 2002.,因没有北京大学样本容量信息,未做比率检验。

民办高校计划内学生, $y=0$ 表示计划外学生, 用二元逻辑回归的 Backward: Wald 方法, 回归得到的结果见表 4。

表 4: 西安民办高校教育筛选的二元逻辑回归结果

自变量	参数估计	Wald 值	显著性	发生比率 Exp(B)
男生(女生为参照组)	-.301	3.036	.081	.740
父亲受大学教育(小学为参照组)	1.328	10.626	.001	3.774
家庭年收入(定序变量)	-.233	6.540	.011	.792
父亲职业(以农民为参照组)				
技术人员	-.500	2.920	.088	.607
高级管理职员	-1.336	11.133	.001	.263
个体户或私营企业经营者	-.502	5.285	.022	.605
常数项	2.031	84.553	.000	7.623

注: 上表中, 回归方程的系数 β_k 为参数估计值, 而 Exp(B) 就是发生比率(odds ratio), 表示自变量一个单位的增加给原来的发生比带来的变化, 虚拟变量的回归结果是该类型相对于参照组而言的, 发生比是参照组发生比的 Exp(B) 倍, 发生比 = 事件发生频数/事件不发生频数。

模型的 Hosmer-Lemeshow 拟合优度指标为 4.827, 自由度为 8, 显著性水平为 .776, 表明统计不显著, 说明模型较好地拟合了数据。同时, 模型的卡方检验值为 37.694, 显著性水平为 .000, 说明自变量可以较好地预测因变量事件是否发生, 代表解释力度的两个 R^2 指标分别为: Cox & Snell R^2 为 .045, Nagelkerke R^2 为 .0697。

对于表 4,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有以下的含义:

- (1) 父亲受过大学教育, 孩子进入民办高校计划内(入学成绩标准较高)学习的可能性就较大;
- (2) 父亲为技术人员、高级管理职员、个体户或私营企业经营者的学生进入计划内学习的可能性小于父亲为农民(渔民)的学生;
- (3) 家庭年经济收入越低, 进入计划内项目学习的可能性就越大;
- (4) 女性成为民办高校计划内学生的可能性大于男性。

父亲受教育程度、职业及家庭年收入等社会分层指标对于民办高校内部教育分层(计划内与计划外)并没有产生一致性的影响, 只有父亲受教育程度与教育分层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 而职业类型、经济收入等与教育分层的变化趋势是相

反的。从总体上看,民办高校计划内项目为低社会阶层的职业群体和低经济收入家庭的子女提供了较多的入学机会。因此,假设一没有得到完全证实。

(三) 家庭背景对毕业去向意愿的影响

将民办高校学生的毕业意向分为两类:就业与继续升学,其中继续升学包含出国留学和国内深造。准备继续升学和就业的人数和比例见表5。从学生总体来看,一半以上的学生毕业后准备立即就业(占54.5%),只有不到7%的学生毕业后准备出国留学,近40%的学生毕业后准备在国内继续深造。在3327位学生中,其中女生1717人,占51.6%,男生1610人,占48.4%;计划内学生1497人,自考生622人,学历文凭生1208人。

表5:西安民办高校各类学生毕业意向统计表

学生类型 毕业意向		学生总体		计划内学生		自考生		学历文凭生	
		人数	比例 (%)	人数	比例 (%)	人数	比例 (%)	人数	比例 (%)
求学	国内	1284	38.6	729	48.7	180	28.9	375	31.0
	国外	229	6.9	97	6.5	45	7.2	87	7.2
就业		1814	54.5	671	44.8	397	63.8	746	61.8
合计		3327	100.0	1497	100.0	622	100.0	1208	100.0

以学生毕业后选择继续升学或就业为因变量,以 $y=1$ 表示继续升学,以 $y=0$ 表示就业,表示家庭背景自变量有父亲的受教育程度、职业和家庭年收入,其中,家庭年收入设为定序变量,分别用1-5表示家庭年收入在5000元以下、5000-15000元、15000-30000元、30000-50000元、50000元以上,此外加入学生性别和学生类型(计划内或计划外)为控制变量。回归结果见表6。

表6:民办高校学生毕业意向的二元逻辑回归结果

自变量	参数估计	Wald 值	显著性	发生比率 Exp(B)
父亲职业(以农民为参照组)				
失业	.313	3.689	.055	1.367
技术员	.350	6.619	.010	1.419
高级管理职员	.711	12.083	.001	2.037
公务员	.500	9.677	.002	1.648
个体户或私营企业经营者	.188	3.741	.053	1.207

父亲受教育程度(小学为参照组)				
初中	-.237	7.590	.006	.789
大学	.230	3.143	.076	1.259
学生类型(以学历文凭学生为参照组)				
计划内学生	.736	96.551	.000	2.087
家庭年收入	.109	7.953	.005	1.115
常数项	-.879	68.327	.000	.415

模型的Hosmer-Lemeshow拟合优度指标为11.431, 自由度为8, 显著性水平为.178, 表明统计不显著, 说明模型较好地拟合了数据。同时, 模型的卡方检验值为163.687, 显著性水平为.000, 说明自变量可以较好地预测事件是否发生, 反映方程解释力的 R^2 指标分别是: Cox & Snell R^2 为.051, Nagelkerke R^2 为.069。

在学生毕业以后是否选择继续求学方面,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有以下结果:

(1) 父亲受过大学教育的学生比父亲受教育程度为小学的学生有更大的可能选择继续升学, 但是, 父亲受教育程度为初中的学生比父亲受教育程度为小学的学生有更小的可能选择继续升学;

(2) 父亲职业为技术员、高级管理职员、公务员、个体户或私营企业经营者的学生比农民(渔民)家庭子女有更大的可能性选择继续升学;

(3) 家庭经济收入高的学生有更大的可能选择继续升学;

(4) 计划内学生以比学历文凭学生有更大的可能性选择继续升学。

因此, 这里在较大程度上验证了假设二: 父亲受教育程度、职业和家庭年收入对学生继续升学有正的影响。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分析了社会分层对于高等教育分层的影响。社会分层是通过家长的受教育程度、职业、经济收入等因素决定的, 教育分层表现为接受什么层次和水平的教育, 它取决于子女的学业考试成绩和家庭经济支付能力。

本文重点进行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分析: 首先, 比较了民办高校学生父亲的职业和教育背景与社会同龄人家庭的职业和教育背景, 发现前者好于后者, 说明社会经济背景优越家庭的子女更有条件接受高等教育(包括民办和公立); 其次,

比较了民办高校学生父亲的受教育程度与公立高校学生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发现前者在初中和高中教育程度上占有较大的比例,而后者在小学和大学及以上教育程度上占有较大的比例;第三,比较了民办高校计划内和计划外学生父亲的职业、教育和经济背景,发现父亲受过大学教育对于子女进入民办高校计划内学习项目有正向作用,但是父亲的职业水平以及家庭经济收入对于子女进入民办高校计划内学习项目有负向作用;第四,比较了不同家庭背景子女从民办高校学生毕业后的去向意愿,发现从总体上看,父亲的受教育程度、职业水平和家庭经济收入对于孩子继续升学有正向作用。

从第三点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分层对于教育分层的影响是多方位的,这可能既与中国社会重视教育的文化传统有关,也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各个社会阶层的不定型和按照不同指标划分社会阶层产生的不一致有关。从第四点可以推测未来的发展趋势,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社会阶层的稳定,社会分层对于教育分层的影响作用有可能增强。[24] 这应当引起教育决策者的高度重视。在教育与社会关系日益密切的情况下,要缩小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就应该设法缩小教育机会上的差距;而要缩小教育上的差距,又不能仅仅在教育系统内部做文章,必须考虑社会因素对于教育系统产生的影响。

通过上述实证分析发现,民办高校学生的家庭背景与公立高校学生的家庭背景相比,并不存在着一致性的显著差异。也就是说,并非有钱人的子女上民办高校,也并非贫困家庭的子女上公立大学。从另外一方面看,办学水平相对较高的公立高校可以得到国家财政拨款,向学生收取较少的学费;而办学水平相对较低的民办高校却几乎得不到任何财政补助,向学生收取较多的学费(计划内学生学费水平低于计划外学生学费水平)。在这种财政制度安排下,势必会扩大公立高校学生和民办高校学生在经费负担和教育质量上的差距。因此,政府应该采取适当的方式对民办高校进行财政补贴,减轻民办高校学生的经济负担,缩小民办高校与公立高校之间的差距。

本研究力图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分析社会分层对于教育分层的影响,但其局限性会影响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和可靠性。首先,本研究的调查数据口径与全国人口普查以及公立高校毕业生调查数据口径不完全一致,这会影响三者之间的可比

性;其次,本研究所采取的抽样方法不是完全随机抽样,存在着一定的抽样代表性偏差;第三,回归分析中的R²偏低。

参考文献:

- [1][3]戴维·波普诺. 社会学[M]. 李强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 [2]陆学艺. 当代中国社会流动[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1-32.
- [4]丹尼斯·吉尔伯特,约瑟夫·A·卡尔. 美国阶级结构[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李志君,刘欣. 教育与社会分层:文献回顾及其启示[J]. 信息与开发,2000,(1).
- [5]Jones, Brian J. et. **Sociology : micro, macro, and mega structures**[M]. 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1995:
- [6]Halsey, A. H. Towards Meritocracy? The case of Britain. in **Power and Ideology in Education**[C]. Edited By Jerome Karabel and A. H. Halsey. (ed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 [7]亨利·莱文. 西欧的教育机会均等和社会不平等[A]. 亨利·莱文. 高科技、效益、筹资与改革——教育决策与管理中的重大问题[C]. 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
- [8]Lucas, Samuel R. Selective Attrition in a Newly Hostile Regime: The Case of 1980 Sophomores[J]. **Social Forces** ,1996:.
- Clancy, Patrick.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Ireland: Participation and Performance[J]. **Higher Education Quarterly**, 1997:
- Lee, W.O. Equity and Access to Education in Asia: Leveling the Playing Field[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1998:
- James, Richard. Non-Traditional Students in Australian Higher Education: Persistent Inequities and the New Ideology of 'Student Choice' [J]. **Tertiary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2000:
- [9]陈晓宇,闵维方. 成本补偿对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的影响教育与经济[J]. 教育与经济, 1999, (3).
- 丁小浩. 对中国高等院校不同家庭收入学生群体的调查报告.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0,(2).
- [10]余小波. 当前我国社会分层与高等教育机会探析——对某所高校2000级学生的实证研究. 现代大学教育[J]. 现代大学教育,2002,(2).
- [11]丁小浩. 对中国高等院校不同家庭收入学生群体的调查报告清华大学教育研究[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00,(2).
- 丁小浩. 中日高等教育成本补偿相关问题的比较研究教育与经济[J]. 教育与济,2002,(2).
- [12]王香丽. 高等教育大众化与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现代教育科学[J]. 现代教育科学,2004,(1).
- [13]李强. 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
- [14](瑞典)托尔斯顿·胡森(Torsten Husén). 平等——学校和社会政策的目标[A]. 张人杰. 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C].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 [15]钱民辉. 教育社会学——现代性的思考与建构[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丹尼斯·吉尔伯特,约瑟夫·A·卡尔. 美国阶级结构[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 [16]Brown, Phillip and Lauder, Hugh, **Education, Global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ducation: Culture, Economy, and Society**[C]. Edited By Halsey A. H. et al.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 [17]Seeberg, Vilma. **Stratification Trends in Technical-Professional Higher**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 Post-Mao China[C]. Edited By Michael Agelasto and Bob Adamson ,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18]约翰·奈特, 李实. 中国居民教育水平的决定因素[A].

赵人伟.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C].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19]李春玲. 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1940—2001)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3, (3).

Zhou, Xueguang, Tuma, Nancy Brandon and Moen, Phylli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Job-shift Patterns in Urban China, 1949 to 1994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7:

[20]Zhou, Xueguang, Tuma, Nancy Brandon and Moen, Phylli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Job-shift Patterns in Urban China, 1949 to 1994.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 1997:

李志君, 刘欣. 教育与社会分层: 文献回顾及其启示信息与开发[J]. 信息与开发, 2000, (1).

[21]刘精明. 教育不平等与教育扩张、现代化之关系初探浙江学刊[J]. 浙江学刊, 2000, (4).

[22]林南, 边燕杰. 中国城市中的就业和地位获得过程[A]. 边燕杰. 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C].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02.

[2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 2004 中国发展报告[R].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4.

[24]刘精明. 教育不平等与教育扩张、现代化之关系初探浙江学刊[J]. 浙江学刊, 2000, (4).

李春玲. 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1940—2001) 中国社会科学[J]. 中国社会科学, 2003, (3).

约翰·奈特, 李实. 中国居民教育水平的决定因素[A]. 赵人伟.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